

宋学研究集刊

SONGXUE YANJIU JIKAN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第1辑]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宋学研究集刊

[第一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学研究集刊. 第一辑 /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308-06284-8

I. 宋… II. 浙…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宋代—丛
刊 IV. K244. 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760 号

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曾建林

封面设计 卢 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42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284-8

定 价 4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宋学漫谈	(1)
宋代的武选官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赵冬梅(13)
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线	
——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将为例	伍伯常(32)
论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	余 蔚(44)
君道与“君臣之分”	
——从《尚书义》论王安石的君臣观	方笑一(75)
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	刘成国(90)
宋代宗室入仕任官问题探析	何兆泉(112)
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新探	何勇强(137)
试论宋代“侍从”内涵的变化与元丰官制改革之关系	王 宇(162)
飞锡者可以驻足,行李者可以息肩	
——宋代寺庙的旅宿空间特质	吴雅婷(176)
宋代富民释疑	郑铭德(197)
宋代富民的婚姻网络	
——从“女必嫁士人”说起	高 楠(221)
《夷坚志》所见南宋乡村社会管窥	刁培俊(239)
艳曲的散去:荆襄道在宋代衰落的原因	陈 曦(276)
宋代金衢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变迁与行担手工业的盛行	王一胜(287)
“吕洞宾过沈东老”仙话考述	周扬波(301)
南宋明州州学先贤祠与人物祭祀	郑丞良(320)
从先贤祠到乡贤祠	
——从地方祭祀看宋明地方秩序的转变	魏 峰(348)
试论北宋的学校取士	吴铮强(358)

宋学漫谈

何俊按:2007年8月19日下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借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邀请在京部分业内学者,就宋学及其研究进行了学术座谈,以下是座谈会的发言纪要。

何俊(浙江大学哲学系、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首先,感谢各位冒着酷暑赶到北大参加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南教授为会议提供了种种便利。作为发起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召开这次“漫谈宋学”座谈会的缘起。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8年,当时是为了申报教育部重点基地而成立的,以前没有这样的机构。第一任主任是龚延明教授。这个中心从成立至今,基本上是一个虚的机构,直到2005年成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后,算是有了一点发展的资源。2004年我接任主任,现在中心的学术委员会由束景南、龚延明、沈松勤、包伟民四位教授,再加上我组成。我们分别来自中文、历史、哲学、古籍所,因为学科专业背景各不相同,却又集结在“宋学”这面旗帜下,因此大家不可避免对“宋学”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无论就学术本身,还是就实际操作,对“宋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一定厘清是必要的。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既有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也有宋史界、宋代文学史界的,我希望能通过这个座谈会,让不同的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讨论,使“宋学”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明确化。

就中国大陆而言,宋学受到广泛的重视,应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邓广铭先生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略谈宋学》。此文影响很大,因为在邓先生以前,学术界习惯于将“宋学”等同于理学,譬如清初学者中间的汉

宋之争、清代《明史》编纂群体内部对“道学传”存废的争议,都是这种宋学观的反映,也曾影响过邓先生。但是,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外延远大于理学的“宋学”概念和“宋学”史观,这实际上修正了邓先生自己以前的观点。近年,漆侠先生的专著《宋学的形成与发展》又沿此发挥了邓先生的“宋学”概念。

其实在中国大陆以外,对“宋学”的探索也有不少精彩之见。如余英时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对清代儒家知识分子内部的汉宋之争进行过富于新意的划分,对“宋学”提出独到的界定。日本学者楠本正继的《宋明理学研究》一书,对这个问题也有讨论。总的来看,余先生和邓先生都把“宋学”的外延扩展为对宋代学术文化的总称。

近年来在对“宋学”的学术史略做梳理后,以下四个问题是我思考“宋学”时常需面对的:

1. “宋学”是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学术范式?是不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形态?近年来有所谓“新宋学”之说,语出陈寅恪先生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似乎也是专就学术范式讲。

2. 如果“宋学”是一种学术范式与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它的构成是怎样的?具体地说,作为文化形态的宋学与作为知识形态的宋学,是如何统一的?

3. 如果承认宋学作为一种范式是以知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两种形式存在的话,那么宋学能否涵盖元、明、清的学术范式与文化形态?清代的考据学在知识形态上是反对宋学的,但是在文化形态上又符合宋学。从近代往下看,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汉学、宋学的互动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 最后,当前的宋学研究面临着学科壁垒的问题,在现有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架构中没有容身之所,如何打破这一壁垒,实现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我引这么个言,下面请各位谈。

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教授):

可能大家都有同感,现在宋学这个概念的用法比较混乱。宋学的共

同基础是什么？我想，不妨超越宋学来谈宋学。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超越《宋史·道学传》，打破《道学传》以来狭隘的宋学观。譬如《儒林传》里面的，是不是“宋学”中人？又比如北宋前期，像王钦若、寇准、王旦这样的人，可能都是对后来学术和思想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在《道学传》不收，因此后代的宋学研究也很少注意王钦若、寇准和王旦。不仅如此，还要注意到宋学决不仅仅是儒学，宋代的道教、佛教都应该纳入宋学的考察范围。

第二，从外部环境看，宋代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蒙古几个周边政权，维持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朝贡体制的并立局面。从现有材料看，宋与这几个政权统治区域的文化交流、学术互动比较繁荣，这一点可以从宋朝频繁地下令严禁书籍外流看出来，它恰恰反映了民间书籍贸易和知识流通是十分活跃的。因此，我们考察宋学就不应该将其与辽、金、夏、元统治区域的学术思想割裂开来。

第三，从历史来看，宋代继承了五代的政治遗产并且加以反思，这一点已经为学术界高度重视，但是，宋代与五代之间的思想传承受到的关注一直不多。而实际上，北宋思想界针对的所有问题，都与五代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不理解五代思想就无从知道宋学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由何而起。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远在南宋灭亡之后。

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藤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

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来源有三方面。首先，内藤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影响，而日本史学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欧洲历史学。其次，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确地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藤湖南。再次，“近世说”的提出，与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

很大,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藤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 Age),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

最后,我想特别讲一讲关于宋代道教史研究的问题。过去的宋代思想和文化史是一个编成的大辫子,它构成一个很强的脉络,让人很难走出去,看清楚,所以现在要把这条辫子解开,回到披头散发的时候,重新来看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应该怎样写,也就是说通过“去脉络化”,实现“再脉络化”。我觉得,宋代的道教在这个重组的历史中应该有位置。当前的宋代道教研究非常薄弱,一部像样的《宋代道教史》一直没有出来,真是一大缺憾。从文献看,《道藏》文献从宋代起比较乱,其中的历史脉络直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楚,碑刻资料整理得还不够,无法重新建立脉络,宋人集部文献中大量散见的道教史料,也缺乏系统和全面的发掘,当然,宋代缺乏一流的道教思想家,导致习惯用传统写法的人无法下手,这也是一个原因,当年金中枢作的,就算是好的了。

总体来说,我认为对宋学概念采取更宽泛化的策略是好的,对学术研究有益,有时候对边界过于斤斤计较,反而可能画地为牢。

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葛先生提到的道教研究薄弱的问题,我的感受是,现有道教研究对政治化的道教与道教的政治化,尤其北宋的真宗、徽宗两朝的道教,着墨过多。反而对道教自身内部的发展的研究极其缺乏。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可能是道教中衰开始的时期,因为宋以后佛教的世俗化、简捷化对道教的挑战很大,而道教自身的改革没什么大的起色,因此在宋以后佛教、儒家两家排挤下有衰落之势。

陈 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觉得葛兆光刚才谈的宋学概念有四个超越,超越了《道学传》、超越了宋代的断代、超越了宋代的疆域,第四个超越就是对儒学超越,也就是佛教、道教都进入宋学范围。这第四个超越可以在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源头,以宋学广阔的外延涵盖了宋代的一切学问、艺术。

其实我比较支持对宋学概念的多元化理解,这些理解之间互相并不排斥。但需要注意的是,多元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宋代理学与广义的宋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理学在宋学各支组成的总体中的地位到底如何?邓先生在《略论宋学》中承认,理学为宋代“新儒学”的一部分。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理学应该是宋学的核心、重心。邓先生的“新儒学”实际上还包括了文学,但是王安石的文学是宋学的一部分,柳永的文学就不是,因为柳永不是“新儒学”的一分子。儒学也是如此,北宋前期的经学仍以汉唐经学为主流,这自然不是“新儒学”,按照邓先生的定义也不能成其为宋学。所以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邓先生文章中的“宋学”并不是宋代的所有思想、学术,而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宋代的思想学术。这样定义,是否妥当,我以为还可以研究讨论。

李华瑞:

我并不十分赞同陈来对邓先生的宋学定义的看法。从学术史看,尽管关于宋学的论述汗牛充栋,但是只有邓先生的观点是超越了《宋元学案》,刚才陈来提到的文学问题,恰是邓先生孤明先发,冲决了思想史、理学史的小圈圈,而把宋学定义为具有全方位、多领域影响的一种潮流、趋势。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我印象中,邓先生在《略谈宋学》似乎没有把文学包括进去。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略谈宋学》这篇文章中确实把文学也包括到了“宋学”之中。刚才大家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这里我想简单讲一下我父亲写作这篇文章时的

情况。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发现关于宋学的概念,是以一系列论文逐步呈现的,譬如其中包括《北宋新儒家的觉醒》这样的文章,此文就把欧阳修这样的历史学家也包括到“新儒家”之中。说到《略谈宋学》一文本身,从留下来的手稿看,就有十余稿,至于小的修改更不胜数。我感到,父亲是希望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考察宋学以及宋代知识文化建设者与传承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李华瑞:

实证史学与思想史界是否存在某些隔阂,我一直以来感到很有兴趣的是,思想史界对漆侠老师的《宋学的形成与发展》的看法如何?

陈 来:

其实史学界与思想史界没有很大的差别,起码据我所知思想史研究者对宋史研究动态还是比较关心的,并不陌生,多数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说到不同的话,可能在荆公新学与理学的地位的评价问题上,我与漆先生有点不一致。我们认为新儒学是为了回应佛教的挑战而兴起的,而漆先生不大讲这一点,他更重视儒学内部义理与考证的分歧。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宋学的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接到这次座谈会的邀请后,我就查阅了一些材料,特别是拜读了邓先生的《略谈宋学》和漆侠先生的《宋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想法,今天提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我要讲的大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关于宋学的概念;二是对宋学的评价。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宋学精神概括为“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两条,宋学精神的载体则在书院。前者以王安石为代表,后者以朱熹为高峰。陈寅恪先生又有“宋学高峰说”,认为中国文化未来之发展必然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宋学从字面上看,应该是“宋代的学术”,但学界约定俗成地以“宋代儒学”涵盖宋学,从传统来看,宋学是相当于汉学而言的,到了清代,宋学主要指宋代理学和宋明理学。

这种传统的定义在邓先生那里有了改变。邓先生的宋学观点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宋学是新儒家学派，这个学派萌兴于唐中后期，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第二，理学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理学并不具有宋学宗主、宋学核心的地位，更不能等同于宋学；第三，宋学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汉学引起的反对。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关于理学与宋学的关系，邓先生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就理学而言，邓先生又认为：首先，理学学派定型于南宋，在北宋如二程、张载等人尚不足以称之为学术流派；其次，理学背离了宋学经世致用的原理，转而专门讲求性命之学，而拙于经史之学、考据之学、制度之学。

不难看出，邓先生关于理学与宋学关系的论述，引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理学导源于宋学，是宋学的一支，但是理学又是根本违反宋学的精神的（如经世致用），那么理学还是不是宋学的一部分呢？如果理学不是宋学，那么清代学人公认的以理学为宋学代表的观点，是不是就站不住脚了？

在邓先生以后，漆侠先生在邓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宋学观，认为宋学应该是不同于汉学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学风；理学虽然脱胎于宋学，但是宋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而理学则与社会现实、实践相脱节。按照漆先生的说法，理学仍然是违背了宋学的基本精神，如此，邓先生的观点所引发的矛盾仍然无法得到解释。不过，漆先生已经承认了北宋洛学、关学作为一个学派是成立的，这与邓先生的说法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王曾瑜在《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把宋学作为经学的一种形态，特征是由章句之学转向义理之学，承认王安石新学与理学都是宋学各个流派中占支配与主导地位的，而理学转向内省工夫，脱离实践，自成一格。王曾瑜以经学上的义理之学为宋学各派的共性，以转向内省的心性工夫为理学的个性，虽然王在文中自以为是主要采用了邓、漆两先生的观点，但他的讲法在逻辑上更加妥当。

第二个大问题是宋学内部各流派的评价问题。漆先生和王曾瑜都批评理学是脱离实践，脱离现实；而荆公新学是经世致用。根据我个人的治学心得，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地位不相上下，都可称得上宋学的鼻祖，他的庆历新政也受到了后世包括程朱理学的广泛赞扬，可见

理学家并不排斥社会改革。但同样是大规模的改革,为什么理学派对王安石变法批评严厉呢?我以为个中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党派之争。因为庆历变法的措施如养士、学校、吏治,等等,明显是义利兼顾,而王安石变法则以理财为急务,与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冲突,事实上他的变法后来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流弊,所以引发了一些儒家士大夫批评。

明乎此,也许我们应该严肃考虑一下,能不能像邓先生、漆先生那样,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学家当作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界已经扬弃了这种笼统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宋史界在对王安石的评价方面似乎没有大的改观。至于批评理学家脱离实践,其实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已经有了很明白的分析,理学家的“格君心之非”也是试图改革政治的一种途径,只是理学家从未像王安石那样得君行道而已。总之,简单地批评理学是脱离实践的、内倾化的,恐怕是忽略了思想史上的很多重要细节。

实际上,对于宋代政治得失的总体评价,我倒比较赞同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中的议论,不知道宋史界对这本书的评论如何?

陈 来:

正如李存山刚刚说的,邓先生、漆先生二位在论文中使用的概念有些混乱,表达上不够严谨。

李华瑞:

单纯说理学家代表大地主阶级现在看也难以成立。在宋史界阶级分析的方法,现在已经不占主流,这种方法自身确实有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不能否定王安石的地位,譬如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高度评价,是远在阶级分析法流行以前就出现的。现在看来,讲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专制国家政权,比较妥当。

陈 来:

今天这个机会很好,史学界与思想史界坐在一起讨论宋学问题,这种学科间的交流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更加宽容的史学界。我们在评价宋

学各个流派的时候,也应该秉承这种宽容的、多元的精神,不应该非此即彼,不要制造抑此扬彼的对立,不必为了抬高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地贬低理学。王安石的《淮南杂说》问世,见者以为孟子再世,肯定属于新儒学的进展。关于批评理学家脱离实践的问题,需要放在更广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理学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佛教在身心修养方面对儒家提出了挑战,因此理学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个人身心领域,这也是一种实践,这虽然有别于王安石的政治实践,但是这两种实践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点。

总之,荆公新学也好,程朱理学也好,就其对新儒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言,都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

邓小南:

理学家脱离实践的说法,多年以前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加以纠正了,并且提醒学生注意理学家确实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着社会实践,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建设。所以对这一点,宋史界早已转过弯来,并无异议。

李华瑞:

和思想史界不同,史学界更注重历史的分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南宋与北宋差异很大,荆公新学在北宋的主要对手,还不是理学,因为当时理学习羽翼尚不够丰满,但是到了南宋,理学作为宋学的大宗,我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北宋儒家知识分子中的事功派势力比较强大,到了南宋就逊色一些了。因此,在讨论宋学的定义的时候,务必要把北宋与南宋的分期情况考虑进去,因为有些提法表述对北宋适用,对南宋则并不适用,反之亦然。

张希清:

今天确实是机会难得,不同学科的学者坐下来讨论一个大家都十分关心的论题,很好。宋学问题是宋史界与思想史界研究范围的一个交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邓先生晚年对思想、学术史的问题十分关注,他的关注与哲学史界有所不同,我个人体会是立意深刻,眼光独到。

近几年来,宋代学术史和文化史得到了学术界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思想史学者也在研究思想与政治史的互动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学科的互动交流开始密切起来,二者有合流之势。宋史研究者如范立舟、姜锡东在研究宋学,何俊、田浩、余英时的研究则充分关注了政治与思想的关系,这些都是合流的例证。

宋学的界线确实应该界定一下。邓先生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宋学不是等同于理学,而是一种新儒学,也就是具有宋代时代特色的儒学,沿袭汉学传统的宋代儒学,便不算宋学范围之内。

当然,作为新儒学的宋学仍然比较狭义,广义的宋学甚至包括了宋代文化,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宋学”就是。陈先生的这个提法出自为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的序文,其中用意可以概见。至于开始何俊所说的宋学作为一种学术范式,超越了宋代而下贯到元、明、清,似乎太无边际。

宋学中荆公新学与理学实际上一个代表了“外王”路线,一个代表了“内圣”路线,“内圣”与“外王”是儒学的两翼,不可偏废,好像今天所说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赞同陈来的说法,不要非此即彼。

张 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在今天的讨论中,地位比较尴尬,因为显得有点边缘化。一般来说,宋代文学史界倾向于以理学等同于宋学,而理学与文学有一些互动,文学与思想的关系,理学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所受到的理学的影响,近年来研究比较多,大家都注意到这些互动的情况多发生在南宋,北宋则罕见,可能是因为北宋的理学尚未定型之故。如果如邓先生所说,把宋学定义为新儒学,对我们文学研究界是比较方便的,很多研究可以展开,譬如古文运动的兴起,庆历诗风、文风的突变,都与新儒学有关,而当时理学尚未发育。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刘敞、欧阳修都是古文名家,对文学影响很大,或者其本人就是文学变革运动的主将,像对刘敞的文学创作一直研究不够,就是惑于其经学家的身份,实际上很值得研究。当代宋代文学研究,正在遵循多学科交叉方法纵深推进,不但深入考察理学与文学的互动,还研究佛教、道教的影响,以及政治变革譬如王安石变法

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至于宋学的概念问题,可能哲学史研究者对名相的辨析比较重视,我的感觉是,似乎不必争之毫厘,宋学的外延可以尽可能的扩展,大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箩筐,当然应该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要太细太小,至于具体是什么,可以再讨论。

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深深感到近年来宋代文献整理成绩巨大、成果丰富,而宋代文学史研究界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运用和研究,还很不深入,很不充分。以我个人来说,在看到《全宋诗》前,对宋代的诗歌有很多想法,《全宋诗》出来后一看,原来很多想法都被新的资料所推翻与修正,所以现在说话也谨慎了很多。从史料的角度看,宋学的兴起不仅是儒学的创新,也是新知识、新学问涌现的时代,譬如金石学就是新学问,也应该是宋学的一部分,但是尚未纳入宋学研究的视野。为什么宋学的思想部分在不断创新,宋代的艺术却崇尚仿古,其中原因何在?宋代还有比较发达的格物之学,如《荔枝谱》,各种花谱等博物学著作,虽然其著作本意是休闲,但也有科学价值。这些领域的现象,如何与宋学的新儒学联系起来,或者说宋学的核心如何统摄、概括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陈 来:

知识形态这个词,何俊很喜欢用,我有点不同意见。宋学中的有些东西可以说是知识,但是有些东西则不是,譬如宗教信仰、理学的体验,都不能以知识概括。

至于说到宋学的概念,我想目前至少有五种。(1)宋学是一种广义的学术范式,宋代理学代表的义理学术范式,一直延续到清代;(2)宋学是宋代的文化;(3)宋学特指一种性命义理之学;(4)宋学特指宋代的儒学;(5)宋学等于理学。我自己偏向于把“宋学”作为概括宋代儒学的学术思想的概念。一般来说,思想史界的习惯多不以“新儒学”的概念来等同于“宋学”的概念,但是邓先生提出的“新儒学”的问题又很有道理,就是点出了“宋学”的重点即是此种“新儒学”。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显然司马光也是“新儒学”,朱熹的《六先生像赞》中就有司马光,大约编成于南

宋孝宗乾道年间的《诸儒鸣道集》所反映的思想谱系也是很杂的,这说明“新儒学”的外延是相当宽泛的。漆先生也肯定范仲淹、欧阳修。总之,可以说理学是在宋代儒学的气氛、大背景下,以及很多先驱者的积累下脱颖而出的,因此,对邓先生的定义可以再进行深入研究。

宋代的武选官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北京大学 赵冬梅

从太宗朝起,诸使和三班使臣人数激增,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有内职之名,却不再服务殿廷,而是或“董兵戎”或“厘事任”,担任各类差遣。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御制的《武臣七条》^①中,“诸司使而下”因担任外任统兵职位(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而被归类为“武臣”。外任差遣在诸使与三班使臣身份定位中的分量超越了其本来职任,诸使与三班使臣从职位符号向品位符号演变。相应的,真宗朝以后,与诸使机构同类的中央事务机构群继续增长,但其长官不再以“使”为称,诸使机构的发展宣告结束。到仁宗朝前期,三班使臣、诸使的磨勘年限已先后设定,内职的选任不再“断自圣心”,而转由机构和制度处理。在宋初的七十余年间,诸使和三班使臣完成了从内廷向外朝、“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武选官有时仍然被称为“内职”、“近臣”,但是,“内”与“近”对于大多数武选官而言,只是历史的流风遗韵。

武阶不是武选官品位符号的全部,其上又有刺史、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与节度使,武选官不落武阶,加领刺史至节度观察留后,增加梯级,是为“遥郡”,落武阶只带刺史以上至节度使,是为“正任”。遥郡与正任是所谓“右列序迁之宠”,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品位符号。

^① 《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第12册,第4008页。